

南朝四大诗人“舟行丹阳”的故事

文/蒋国清

丹阳大运河，堪称丹阳的文化瑰宝，是流淌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千年史诗。千百年来，运河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盛，历代众多文化名人在此留下了大量运河文化故事及传唱千古的诗作名篇。南朝时期是迄今发现丹阳运河诗歌遗存最早的年代，其中，南朝四位著名诗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中国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南朝宋文坛领袖人物颜延之、南朝元嘉三大大家之一鲍照都在丹阳大运河留下了不朽诗篇。充满诗意的丹阳大运河，可谓名副其实的水上“古诗之路”。

陶渊明千里参军“行经曲阿”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为生活所迫，于不惑之年出任东晋“北府兵”镇北将军刘裕的参军，离家千里赶赴军府所在地京口(今镇江)上任。陶渊明沿运河乘船行经曲阿(今丹阳)时，写下了其宦游时期的代表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渺渺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该诗前半部分追忆诗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志趣，写他本以安贫乐道、抱朴含真为最高旨趣，只因经济窘迫，才不得不因就军职而辞别家园为“禄”而仕的情景。后半部分则回到眼前的旅途中来，写羁旅的愁绪和复杂心情。悠远的行程、孤独的行舟，萦绕着绵绵的归思。船向前行，心却飞回了故乡，这种思想与行迹的冲突，构成了陶渊明出仕时期的基本思想矛盾。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十分推崇和喜欢陶渊明的诗，晚年时苏东坡追和陶渊明诗韵而创作的“和陶诗”存有124首，其中就有《和陶始经曲阿》。此外，宋代“湖山居士”吴芾、明代名臣李贤、明末抗清英雄黄淳耀等都曾用陶渊明的这首“经曲阿”诗韵写过和诗。

谢灵运追思君子“晓发云阳”

谢灵运(385年—433年)，名公义，字灵运，南朝山水诗人，佛学家、旅行家，开创中国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公元426年，谢灵运舟行丹阳，前往镇江悼念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写下了五言古诗《庐陵王墓下作》：“晓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冈。眷怀忆君子，沉痛结中肠。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恻，定非识所将。脆促良可哀，天枉特兼常。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举声涕已洒，长叹不成章。”

谢灵运虽以写山水诗见长，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写得真挚动人，情真意切，也是传诵千古的佳作。诗的开头写诗人奉召还京，一早从丹阳出

发，傍晚才到镇江刘宋宗室墓地。面对庐陵王之墓，心头凄苦难言。他想到刘义真的为人、自己与刘义真的情谊、刘义真的被害以及自己因受牵连而被逐出京城等，顿觉“沉痛切中肠”。同时，这首诗也抚今思昔，寄托了诗人自身政治上的沧桑之感。

颜延之曲阿伴驾“侍游后湖”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文坛领袖人物、文学家，著名诗人。他的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今存诗29首，其中就有《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春方动宸驾，望幸倾五州。山只辟峿路，水若警沧流。神御出瑶轸，天仪降藻舟。万轴胤行卫，千翼泛云浮。凋云丽璇盖，祥飙被彩旒。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金练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眄观青崖，衍漾观绿畴。民灵蹇都野，鳞翰耸渊丘。德礼既普洽，川岳遍怀柔。”由于颜延之是刘宋王朝的四朝元老，因而该诗的创作年月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意见是创作于永初二年(421年)宋武帝刘裕幸丹徒时；另一种意见是创作于元嘉四年(427年)宋文帝驾临丹徒并游湖时。

曲阿后湖，即丹阳练湖，是丹阳大运河的调蓄水源。从西晋末年经东晋、南朝、隋，到唐初，练湖被叫做“曲阿后湖”，是当时江南地区的一大名胜。该诗虽是一首应制诗，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核，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文学思潮和主流意识。瑶轸、藻舟、璇盖、彩旒等用字注重色彩上的渲染，犹如一幅多彩绚丽的水彩风景画，为今天的读者呈现出1600年前帝王游览练湖的美丽繁华场景。

南朝时期，曲阿后湖因是宋齐梁三代皇帝家乡的名胜而受到格外青睐，有多位皇帝曾经游历曲阿后湖，包括刘宋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孝武帝刘骏及梁武帝萧衍等。其中宋孝武帝刘骏写下了《济曲阿后湖诗》：“宵登毗陵路，旦过云阳郭。平湖旷津济，菰渚迭明芜。和风翼归采，夕氛晦山岵。惊澜翻鱼藻，赭霞照桑榆。”

鲍照云阳登埭“九里感怀”

鲍照(416年?—466年)，字明远，祖籍东海，南朝宋著名文学家，与北周庾信并称“鲍庾”，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大家”。元嘉期间(424—45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聘为国侍郎。孝武帝即位后，任大学博士兼中书舍人、魏陵(今南京市)令、永嘉(今温州市)令等职，后任胸海王前军参军，人称鲍参军。一天，鲍参军自都城建康(今南京)乘船沿破冈渚运河来到云阳(今丹阳)境内的九里埭(今延陵九里村)，登上高高埭堰堤坝，望着这举世罕见的过山运河，思绪万千，写下五言古体诗《登云阳九里埭诗》，感叹“似水流年”的人生旅程。全诗为：“宿心不复归，流年抱衰疾。既成云雨人，悲绪终不一。徒忆江南声，空录齐后瑟。方绝紫弦思，岂见绕梁日。”

时光流逝是最让人无可奈何的，面对因疾病而衰弱的身体，诗人曾经的雄心壮志也已被残酷的现实消耗殆尽，回首当年，沧桑的过往，无限的感慨，远行人，许多愁，在九里埭一起涌上心头……



元青花云龙罐
弥足珍贵的“瓷器之王”



青白两色之间交相辉映的青花瓷，是中华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珍品无数，价值不菲，其中尤以元青花最为珍贵。

元青花的存在更新了中国陶瓷史，在上世纪50年代前，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成熟青花工艺的起点，人们普遍不知元青花的存在，历史上甚至对元青花没有任何记载。拥有“瓷器之王”美誉的元青花被湮没在历史中，充满争议，也充满神秘。纠正这一“误识”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个外国人，一位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位是美国的古瓷专家波普。他们使用的例证是1929年北京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铭为“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元代青花瓷器的标准器——至正时期生产的“至正瓶”。

1966年4月，江苏省金坛县洮西公社湖溪大队的社员们，正在热火朝天的修建水渠。为修渠而挖的土坑已经有两米多深了，突然，一位社员的铁锹不知敲在什么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低头隐约看见一只像是碗的东西，用手拂去碗上的沙土，发现这只大碗居然是银制的，银碗下还扣着一只体型丰满、直颈圆腹的瓷罐。

几名社员共同把罐子抬出土坑，小心地掀开罐子上盖着的银制大碗后，几十件精致华美的银器出现在眼前。这件青花云龙罐和里面的银器，不久后被带到镇江博物馆。专家们通过历史推断，青花云龙罐窖藏被埋进地下的时间，应该是元代的晚期。

青花云龙罐高29.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厘米，造型丰满，端庄大方。主体纹饰为海水龙纹，腹部以青料描绘着精美的双云龙纹，龙细颈四爪。此器先用刻划工具在坯胎上刻画线纹，作为分隔线，在线纹内刻画纹饰，再以钴料绘画，刀法简

练。画面布局不拘一格，两只游龙如奔腾在汹涌的浪花之上，似怒目追逐，又似在并驾齐驱，两部分纹饰浑然一体，相映成趣。釉质光润，笔触有力，青花苍翠浓艳。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最原始的青花瓷雏形在唐宋就已经出现。到了元代，景德镇窑成功烧造出青花瓷，开启了中国瓷器由素瓷到彩瓷的时代。这种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的瓷器一改宋瓷影青之纤薄小巧，隽秀素雅之风格，在当时大受欢迎，青花瓷的制作工艺也慢慢走向成熟。

发现青花云龙罐窖藏的地方，就在长荡湖的西北岸，距离今江苏金坛市大约十五公里，过去曾是漕河水运交通要道，农渔产业也十分兴盛。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自六朝以来，这里就富商云集，居民众多。

元朝晚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各地反抗斗争蜂起。元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至正十二年，红巾军攻占杭州，农民起义的风暴开始横扫江浙地区。

据专家推测，当时的富人为了保命纷纷逃窜，实在无法带走的财物只能埋藏在地下。罐内的银器给青花云龙罐烧造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很大帮助，在青花云龙罐内藏着的50多件形态各异、精美雅致的银器中，有一件银盘上面刻着阿拉伯回历714年的铭文。回历也叫希吉来历，回历的714年是公元1314年，属于元代中期。这证明，青花云龙罐窖藏埋下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314年，而该时间又早于至正时期生产的“至正瓶”，是元青花的标型器之一。

在存世的历史资料中，对于元青花的记载资料十分的稀少。加上中国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并不多，罐类的大型器物则更加稀有，因此这件绘工精良、品相佳好的青花云龙罐弥足珍贵。

(张剑 马彦如)